

南開史學

一九八四年 第二期

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要 目

- 傅兰雅与西学东渐 ······ 朱振华
时代、阶级与玻利瓦尔 ······ 乔明顺
论玄奘译经事业在整理和保存
文化典籍上的贡献 ······ 赵永东
论《顺宗实录》的作者 ······ 卞孝萱

南开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傅兰雅与西学东渐	朱振华 (1)
论梁启超的英雄史观	刘振嵒 (28)
时代、阶级与波利瓦尔	乔明顺 (43)
江华岛条约后美国的远东政策与李鸿章 ——评1882年朝美条约	曹中屏 (64)
试析二战前夕张伯伦的双重外交政策	王大刚 (83)
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原则 的确立	黄若迟 (101)
论玄奘译经事业在整理和保存文化 典籍上的贡献	赵永东 (121)
论《顺宗实录》的作者	卞孝萱 (139)
晋唐士庶买卖婚姻考略	田廷柱 (150)
《诗经·闚官》的写作年代及其史料价值	白新良 (161)
清人笔记随录	来新夏 (169)
清代户部诸官耗羨归公的改革	何本方 (179)
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	常建华 (203)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人诗文集提要 (二)	朱鼎荣 陈作仪 (223)

新 书 简 讯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出版	(27)
《结网录》出版	(63)
《辩证逻辑思想简史》已出版	(82)
《唐前志怪小说史》问世	(178)
《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为我国话剧史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202)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四卷出齐	(224)

傅 兰 雅 与 西 学 东 渐 ①

朱 振 华

傅兰雅是近代来华的英国传教士。然而，他并没有以播教布道著称于世，却以从事翻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书籍和倡办新式教育而名噪中外。本文试就其在西学东渐方面的主要成就略加探讨。管见所及，企盼方家赐教。

傅 兰 雅 之 生 平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颇著成绩，可对傅兰雅其人则罕有专论，甚或对其生平事略亦语焉不详，鲜为人知。鉴于此，有必要对傅兰雅的生平及其在华的主要活动作一简单概述。

傅兰雅（1839—1928），英文名 Fryer, John（弗 赖 尔· 约 翰），一八三九年出生于英国海德城，其父是一个穷教士。傅兰雅少年时代就非常向往中国，他曾这样回忆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最使我高兴的是读所有有关中国的书。如果有人要求写一篇文章，我所选择的题目永远是中国”。②迫于生计，他曾一度辍

①此文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八四届本科生朱振华的毕业论文。

②(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改变中国面貌：西方顾问在中国 1620—1660》第141页。(Spence, Johnathan)斯彭斯著。(以下简称《改变中国面貌》)

学而为人做僮仆。后来，他依靠政府的奖学金进入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Highbury Training College）读书，于一八六〇年毕业。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傅兰雅被英国圣公会（基督教圣公宗为英国国教）遣派来华，先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担任院长。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他接受北京同文馆的聘请充任该馆英文教习（同治三年到馆），一八六五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取替了他的教习职位。随后，傅兰雅来到上海，上海教会组织聘他为英华书院首任校长。在此期间，郑观应曾跟他学习英语。教课之余，傅兰雅殚力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学习。由于他并不喜欢教会学校里枯燥乏味的教书生活，所以，一八六六年他出任《上海新报》（1861年由英人创办）的主笔，“试图通过文章和编辑评论来激发中国读者对外交事务、科学和西方教育的兴趣。”①并撰文向清政府呼吁要中国青年士子进行三年的西文训练，然后派往欧洲各大学学习科学新知。这一建议在朝野上下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订聘傅兰雅“专办译书之事”。从此，傅兰雅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的译书生涯，直至他一八九六年离华为止。在翻译馆，傅兰雅和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等合作先后翻译有关科技文化的英文原著一百四十三种②，成为历史上来华传教士中向中国输入科技文化知识最多的一人。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傅兰雅与徐寿等人发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专门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新型学堂——上海格致书院；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傅兰雅“自备资斧”编辑出版了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一种科技杂志——《格致汇编》期刊。所有这一切，在风气未开，愚昧落后的

①《改变中国面貌》，p146；又，胡道静《报坛逸话》。

②承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说。其实，傅兰雅的译著及其著述，当不啻此数。

当时，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因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普遍称颂。清朝政府亦分别于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二十五年（1899）钦赐傅兰雅三品顶戴和三等第一双龙宝星勋章，以示嘉奖。

傅兰雅居华期间还曾担任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李鸿章奏设，1869年移驻江南制造局，与翻译馆比邻）教习、“益智书会”（1877年耶稣教大公会创设，曾出版不少西学启蒙读物）帮办董事；负责“中国教育会”（1890年由“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而来）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亲自编译刊行数十种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论著。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傅兰雅结束了三十六年的在华活动，受聘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第一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赴美后，他又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科技图书十四种，并捐款赞助兴办了上海盲童学校，“专收中国盲童”就读，且以盲文授课，为中国用盲文教授盲童之嚆矢。^①一九一五年傅兰雅退休后荣任名誉教授，一九二八年卒于美国。

综观傅兰雅的一生，他与中国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少年时代身在祖国（英国）而却是一个“中国迷”；中青年的“黄金时代”，在中国从事科技翻译和致力于教育事业；晚年移居美国，改变了神职身份而教授中国语文，并继续为中国翻译多种科技书籍，捐建盲童学校。同时，他还编著有《中国教育名录》（1895）和《中国留美学生获准入学记》（1909）等书。象傅兰雅这样为中国的西学输入做出重大贡献的外国传教士确乎应该名垂史册。

傅兰雅和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

一八六五年，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创建了上海江南制

^①《民国上海县志》卷九“学校”下。

造局。一八六七年，徐寿创议附设翻译馆，“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抵”得以采纳，翌年六月正式开馆，“由于中西彼此文义扞格不通”，于是，礼聘在字林洋行任《上海新报》编辑的傅兰雅主持翻译事宜。其他又先后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玛高温、金楷理（美籍德人）、林乐知等，和中国学者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王德均、李凤苞、贾步纬、徐建寅等人合作，采取西士口译，华人笔述的形式翻译西方科技文化书籍。

在傅兰雅的主持下，翻译馆的中西人士孳孳研究，配合契合，译述宏富。一八七一年以后陆续付梓行世。据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载，翻译馆在一八八〇年以前“已刊成者九十八部，计二百三十五本；尚未刊者四十五部，计一百四十二本；未译全者十三部，计已译出三十四本。”①至二十世纪初年，翻译馆译书近二百种②，几乎占了当时我国译著总数的一半（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1853—1911年共有468部西学科技译著出版。考其内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矿物、生物、医学、政治、军事、法律、史地、美术和工艺制造等（参看附表一）馆译之书“文辞朗畅”，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不仅官绅文士纷纷购读，而且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和一些教会学堂（如山东登州文会馆）也多用为教科书。一八七九年六月的统计表明：翻译馆刊印之书已售出31111部，共83454

①《格致汇编》第三年卷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以下简称《译书事略》）。

②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著数各家记戴有出入：《教育年鉴》（戊编）：“查先后翻译出版者一百七十八种”；《上海研究资料》：“先后翻译西洋科学书一百八十余种”；《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载实有一百六十三种，另附刊三十二种，《西国近事》季刊108期；《上海县续志》载译书目录亦一百八十多部。

本；地图和海关图的销数为4774张。①就人多“耻言西学”，又无铁路、邮运之便而言，能够达到这个数目是相当可观的了。此外，翻译馆兼译新闻报刊和《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版108期）“每若干时则印三百至五百本，分呈上海及各省官员”，②对开拓时人视野，明晓中外情势裨益尤大。刘坤一曾说：“《西国近事汇编》尤留心时局者所必观……不特周知外事，并可斟酌邦交”。③梁启超亦称“欲知各国近今情状，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④翻译馆藏存各种格致书和《泰西大类编书》（即《大英百科全书》等西文图书数百部，其数之多在当时中国实属罕见。论译著数量和社会影响也是其它官办译书机构无法与之匹敌的（著名的京师同文馆到1888年所译科学书仅十种），许多近代新学科和科技术语被中国人认识就是从“翻译馆”开始的。即使在国外，翻译馆也颇有声誉，所以“常有西人书缄频寄，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究察所用各物之名，访求所译西书之目。”⑤日本更派柳原前光等人来馆求教，并“购取译本，归国仿行”。⑥翻译馆所译“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⑦诚“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⑧

傅兰雅主持翻译馆译书事宜，并非“述而不作”。相反，他在馆时间最长，译著数量最多。他和中国学者合译西学书籍百余部，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①②傅兰雅《译书事略》。

③《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十七。

④梁启超《读西学书法》P.9。上海时务报馆代印本。

⑤傅兰雅《译书事略》序。

⑥《上海县续志·徐寿传》。

⑦梁启超《西书书目表·序例》。

⑧杨模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

天文 数学方面：傅兰雅和著名数学家华衡芳等合译数学著作十余部，为我国输入了近代数学新知。譬如，《代数术》二十五卷，《代数难题解法》十六卷，介绍了代数知识；《微积溯源》八卷，介绍了微积分知识；《决疑数学》十卷，首次向我国输入了新的数学分支概率论。傅兰雅还曾和李善兰试图把牛顿的划时代学术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原译作《奈端数理》。奈端即牛顿）介绍到中国。可是，因其为“西国甚深算学，”理太奥赜”，故仅译出第一卷而作辍，殊为憾事！

物理 物理学方面：傅兰雅在物理学方面的译著主要包括力学（《重学图说》）、电学（《电学大全》）、声学（《声学》）、光学（《光学图说》）、热学（《热学图说》）等，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近代物理学的成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X射线知识的输入。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X光射线（故又名伦琴射线），1899年傅兰雅和王季烈翻译的我国第一部论述X射线的物理学专著——《通物电光》四卷问世。该书不仅对X光射线的产生、性质进行了阐述，而且对它在医疗疾病等方面的应用也作了介绍，并附有多幅X光透视照片。①可见，当时对这一科学新成就的传播是比较及时的。

化学 化学方面：傅兰雅有关化学方面的译著大多是与著名化学家徐寿合译的。同治十年刊刻的《化学鉴原》论述了一般化学基本原理和重要元素性质。此书在十九世纪末以至二十世纪初年屡经翻刻，风靡一时，影响颇著，被人们推为“善本”：《化学鉴原续编》是一部专论有机化学的书；《化学鉴原补编》是有关无机化学的专著，其中已论及1875年发现的新元素镓（Ga）：《化学

①参阅《明清时期西方近代光学的传入》，《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4期。

考质》、《化学分原》（由徐建寅笔述）和《化学求数》分别是关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化学著作；《物质遇热改体》则介绍了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这些化学译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学的基础。另外，他们采取西文名字第一音节命名的科学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他们编制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和《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等为中文命名的规范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①

医学方面：傅兰雅介绍西医西药的医著多由“好医书”的新阳举人赵元益（静涵）担任笔述，以《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影响最大。梁启超尝言“译出医书以《内科理法》（舒高第、赵元益合译，翻译馆刊行——引者注）、《西医大成》为最备。《儒门医学》上卷论养生之理尤不可不读”。^②徐寿也称颂说：“西士傅兰雅，英之儒者也。余与共事最久。算学、化学、声学、制造，无不通晓。又旁及于医，为人治病，往往得效……与赵静涵（元益）译成《儒门医学》一书，上卷论养身之理，中卷论治病之法，下卷论方药之性。附卷《慎疾要言》尤属言简意赅……并附入翻译各书目于后，阅者谅以先睹为快矣。”^③

生物学方面：傅兰雅曾编译《植物图说》、《植物利用》和《虫学论略》等有关动、植物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植物学》是继李善兰和韦廉臣、艾约瑟翻译的《植物学》（1858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之后又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重要译著。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给予高度评价：“动植物学，推其本原，可以考种类蕃变之迹；究其致用，可以为农学畜牧之资。乃格致中

^①参阅《中国化学史论文集》（袁翰青著）；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②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第4页。

^③《格致汇编》第一年卷三：徐寿《医学论》。

最近切近有用者也。《植物学》、《植物图说》皆甚精”。傅兰雅还曾在《格致汇编》中登载题为《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的讲演记录，“中多瑰诡可听之论”，讲明了疾病多由“极细微之生物所成”，从而把细菌和微生物知识传入中国。

矿物学方面：傅兰雅关于矿物学方面译著主要有《宝藏兴焉》《井矿工程》、《开煤要法》、《银矿指南》、《矿石图说》和《冶金录》等，它们或多或少地介绍了矿藏的开采、矿石的鉴别及其冶炼等方面的知识。对近代中国开发地下资源，发展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上述之外，傅兰雅在天文学（《恒星经纬表》）、气象学（《风雨表说》）、测绘学（《测地绘图》）、军事学（《西国兵制源流》）、政治学（《佐治刍言》）、法律学（《各国交涉公法论》），以及史地（《法国新志》）、美术（《西画初学》）和机械制造（《汽机新制》）等方面的译著，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参看附表）。由此可见，傅兰雅译著范围之广博，涉及到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为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著丰富，意义深远。其一，它打破了过去教会译书的垄断地位，扩大了译书的抉择权；其二，它传播了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知识，为我国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奠以基础；其三，它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在馆的徐寿、华蘅芳等通过编译西书，与西士傅兰雅等朝夕相处，切磋学术，其“格致之学，亦由此益深矣”。徐建寅、李凤苞等“因译书而为官者皆通晓西事，能知中西交涉所有益国之处。”更令人瞩目者，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输入的科学新知识，动摇了中国数千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引起了对封建腐朽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萌生了变革社会现实的愿望和要求，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这里着重就如何看待傅兰雅在馆“主持”译书事宜谈点粗浅之见。过去，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传教士（确切地说就是傅兰雅）操纵了翻译馆，因而遇到种种非议。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我认为：翻译馆的译著大权并未旁落于傅兰雅等外国传教士，而是稳操于中国官宪之手。傅兰雅在《译书事略》中不止一次提到“所有初译之书，均呈总督赏鉴”，以求许可；“中国大宪已数次出谕，令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等”^①显而易见，翻译馆译书是受中国当局制约的，傅兰雅所谓“主持”只不过是从事具体的译书技术指导工作。这正是官办翻译机构迥异于教会出版组织的重要标志。仅从这一点看来，官方控制译权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另一面却是那些不懂科学的官僚掌握了译著大权，难免滥用职权，往往流于瞎指挥，结果影响到西学引进中的系统性和可择性，从而削弱了傅著的价值。正象傅兰雅所表白的“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而英国所已有者虽印八次，然内有数卷太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察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②这从反面证明了官宪译权在握，急趋近利却带来了不良后果。这种现象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它反映了洋务派官僚在开始走向世界时缺乏远见卓识和中西方国家间的差距之大，所以说对中国官宪控制译权所引起的一些副作用无可厚非。当然，我们也不能走上另一个极端，因为官宪手操译权就

①②《格致汇编》第三年卷五：《译书事略》。

抹煞了傅兰雅的“主持”之功。事实上，从译著的选本到刊行问世，仍赖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协作，它的每一道工序都不是官宪之辈所能取而代之的。而傅兰雅却是翻译工作的真正领导者，况且，他非常喜爱译书事业。他在一封私函中曾写道：

“……我找到了令人满意的寄托。我可以说，我一生还从来没有过我为中国政府做科技书籍翻译时那么幸福。”①因此，傅兰雅“常居局内，专理译书，故人远处，无暇往来”，在馆二十多年竟不曾译有一本宣教之书，委实令人敬佩。再则，清廷以八百镑的年薪使他生活舒适，钦赐三品官衔使他感到荣耀，这可谓是傅兰雅从事翻译能够竭诚尽职的一种动力。一言以蔽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所以成就卓著，名闻遐迩，是与傅兰雅的辛勤劳动和中西人士的密切合作分不开的。

傅 兰 雅 和 上 海 格 致 书 院

创办上海格致书院和编辑出版《格致汇编》是傅兰雅寓华期间的又一重要活动。

上海格致书院由英驻沪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在一八七四年三月五日(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七日)首倡创设，于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一日)正式开院。其间，由中西人士八名组成的董事会(华董为唐廷枢、徐寿、王荣和、徐建寅；西董为麦华陀、福弼士、伟烈亚力和傅兰雅)曾多次聚会商讨筹建书院事项，而具体的筹集经费，择地造屋，购置器具，备藏图书，禀准当局，制订章程以及书告中西绅商捐资赞助等等，实由傅兰雅、徐寿经手完成。几经周折，最后选定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建筑书院，至一八七五年冬基本告竣。转年六

①《改变中国面貌》。

月开院之日，“大启院门，设筵宴客，敦请中外绅商士庶之预闻其事者”。①李鸿章亲笔题写的“格致书院”匾额高悬正门。慕名前往书院参观者擦肩接踵，赞叹不已。

格致书院内设格致室、知新堂，以“讲教各种格致之学”，“预备全副格致之器”；书房（后增设藏书楼一座）内藏中西文图书报刊，且“存售各种译成华文之格致书”；尔后由英人捐建的博物馆更为壮观，其建筑“计阔五十尺，长二百尺，高四十余尺，窗牖均嵌玻璃”。博物馆中陈列有英国科学博物馆和比利时等国捐赠的各种科学仪器、工艺机械、生物标本、水陆交通、绘图照像、天文地理、枪炮弹药，以及服饰、食品等物件的样品或模型。②然而，一八七六年格致书院开院时并没有开课讲学，由于人事变动（麦华陀、伟烈亚力返英，丹文、玛高温继任董事），兼之，“西北各省连年亢旱”，经费难筹，致使格致书院一度陷于停滞状态，一八七九年始见转机。于是，在《万国公报》和《申报》上登出“招生公启”，声称该院可容纳数百人，“学有二端（西国语言文字和算学、化学、矿学、机器等格致实学），听其所向”，学期为二年，并拟定于次年正月开学授课。③

格致书院开课讲格致诸学，求学者络绎不绝。徐寿、华蘅芳等居院教习，“昕夕不倦”。“四方好事者造请无虚日，算术、格致、矿路、制造之属，随事指陈，各满其意而去，以故通达者众，风气为之大开”。④一八八四年徐寿病逝后，傅兰雅提议对青年加强科学新知的灌输，遂决定增设山长（院长），于是就礼聘由香港返沪定居的王韬为格致书院山长（1885—1897）。此后的十年，格致书院得到长足的发展，“院中肄业士子，多则

①《申报》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一日，第1275号。

②《上海县续志》卷九。

③《申报》光绪五年九月十八日；又《万国公报》。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第30页。

百余入，少亦数十人，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以期于格致之学渐能深造而有得，他日以家修为廷献，出而宣力于国家”。^①傅兰雅和王韬创行的四季考课（光绪丙戌年始行）以及春秋两季特课（光绪己丑年增置），尤为世人注目。他们邀请中外社会名流（南北洋大臣和各海关道员居多）如盛宣怀、李鸿章、郑观应、薛福成等命题考试，命题内容不外乎科技知识、中外时局、富强策略和人才教育等。傅兰雅先后两次命题课士，分别为《华人讲求西学，用华文、用西文利弊若何论》《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以俾国家、商民均沾利益论》。参加考课者既有格致书院和广方言馆的肄业生，又有功名士子，贡举官绅。论其籍贯，以来自苏、沪、浙、粤的最多，其余则来自津、鲁、豫、鄂、湘、闽诸省市。全部课卷通过详审评定名次，给予奖誉，并择优秀者辑为《格致书院课艺》刊印传世。考课从光绪十二年王韬监院至光绪二十三年例行不辍，“应课者济济多士动辄百数十人，而且嘉言谠论，多发明洋务、西学，此格致学为之一振”。^②从现存的 1886 — 1894 年《课艺》获知，仅名列超等、特等和一等的多达 1878 人次（援引自《华东师范大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潮》）。倘若再进一步考察这批热血青年的课卷，其字里行间更迸发着时代的思想火花——

“中人以身心性命三纲五常为格致之根源，”“西人以水火光声化算电热为格致之纲领”，“西人格致之学不可不讲也”；

“我中国儒生耻言攻利，不如西人之矜言创造之夸多斗异耳”；

“今昔绝然不同，则其变也，盖时势使然也”，“天下事无

①《格致书院课艺》辛卯卷上，王韬序。

②傅兰雅《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序》，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新镌本。

有利无弊也，惟变通乃可以尽利”，“中国诚能以格致一变从前之陋，则再越百年，不难驾西人而上之。举凡释、道、老庄，红黄喇嘛、回回、犹太、希腊、耶苏各教，亦一扫而空，岂不快哉”；

“振兴工艺，莫如令商人设立公司，一切布置皆由商人自为主持，不必由官督办”；“南北洋大臣均有通商兼衔，其实为保护洋人起见，并非为整顿工商而设也”；

“国之所以立者，民；而君听命于民者也”，“夫建君，所以为民立政，所以便民设官，所以理民顺民之心，行民之事”。盛赞英国“立法独为美备”，提出法国议院制在中国“可行于今者。”①

这些溢于笔底的铮铮言辞，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富强的渴望，抨击了社会现实的腐朽，抒发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羡慕之情，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描绘了变法维新的理想蓝图。诚然，青年知识分子富于脱离客观实际的幻想，然而，他们毕竟喊出了前人未发的时代强音。这批“留心时务，蒿目时艰”的有志青年，一旦步出课堂，踏入社会，对启发社会新思潮所产生的能量就不言而喻了。

傅兰雅热心院务，讲求实际。他往返于翻译馆、格致书院，或潜心撰述，或趁暇教讲科学新知。并且究心于科技教育课程的实施。傅兰雅不满以制艺帖括为内容的科举制度，冀望重视格致之学。他曾感慨地说：“近来考取人才，乃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亲睹华人得其大益。虽不敢期中国专以西学考取人才，然犹愿亲睹场中起首考取格致等学，吾其拭目望之矣”。②在经费拮

①《格致书院课艺》。

②傅兰雅《译书事略》。

据，师资奇缺的艰难情况下，傅兰雅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季毅然倡行夜课，“意在振兴格致，鼓励人才，使有志之士知所勤苦奋勉，发愤兴学”。“定于每礼拜六晚躬亲教习，凡聪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许来院习学”。并拟定“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和“制造”六门课程，诸学“皆以算学为入手”。傅兰雅亲任算学教习，兼职化学试验。“常从学者三、四十人，每次发给数学课题十余道，使自习揣摩，演草于卷，交出批阅。每礼拜六晚为之细讲各题之理法，使之明悉。满一月则面试，百分中能考得七十五分以上者为中式（及格），照给课凭一纸，以证所学有成”。①一门考核合格即可改修它门课程。这种夜课方法颇为从学者欢迎。傅兰雅亲自起草拟定的《格致书院西学课程》于同年付梓行世，对当时书院中的授课方式、科目分类、课程安排及考核办法等备加阐述（参看附表二）。后附傅兰雅在院教习的数学题二十四课三百五十七道及其答案，“凡例”中对如何使用阿拉伯数字和+、-、×、÷、=、 $\sqrt{ }$ 、:、:等数学符号也作了介绍（这在当时还是全新知识）。《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实开中国近代实施新式教育之先河。可惜的是，在傅兰雅离华赴美后，他的西学教育计划没能得以很好的履行。

早在创院之初，傅兰雅就自费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种科技杂志——《格致汇编》（英文为 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第二月改译称 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它创刊于光绪二年正月（1876.2），光绪十八年冬（1892.12）停刊。月出一卷（1890年以后改为季刊），由格致书院发行，全国各大埠镇出售，先后出版七年总六十卷。《格致汇编》凡西国科技新知无不涉猎，除从英、法、美等国的格致书刊中摘译“格

①傅兰雅《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新镌本。

致要端”外，也刊登中国学者和寓华西人的科技论文，如徐寿的《医学论》、丁韪良的《论代笔新机》、狄考文的《侯氏电机》和毕利干的《化分中国铁矿》等等。同时，对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也多有介绍，对中国如何发展科技提出一些相当中肯的建议。另外，还刊载中西科学家的生平传略（如李善兰、富兰克林、瓦特）和西国工业新产品广告。傅兰雅从读者来信中选择那些“所问之事果有益于众人”的有关格致、工艺诸方面的疑难问题，依次奉答，刊诸“互相问答”专栏，这样先后共解答全国各地读者提出的问题三百多个，《格致汇编》影响范围之广和时人对之信赖态度由此便见一斑。总而言之，《格致汇编》是一种内容丰富，体裁别致，图文并茂，便利初学的科普读物。它所载科技知识尽管零散，但却有不少是首次传入我国（若《人与微生物争战论》介绍的细菌和微生物知识；《西国养蜂法》“言用光学聚蜂，以化学察蜂等理”）。它对世界博览会和外国风俗的文化记述亦令人耳目一新。梁启超对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就极为推崇，他说：《格致汇编》“皆言西人格致新理，洪纤并载，多有出于所翻各书之外者，读之可以增益智慧。惜当时风气未开，嗜之者终复无几，闻傅兰雅因译此编赔垫数千金云，故光绪十六年（应为光绪十八年——引者注）以后即不复译。今中国欲为推广民智起见，必宜重兴此举矣。”①《格致汇编》即使停刊后也屡经翻刻再版，单行本也不断涌现，对传播科学，启迪民智裨益匪浅。

上海格致书院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方面，始终未能培养出杰出的科技人才。傅兰雅曾寻究其原因说：“一由于风气未开，鲜知格致之益；一由于经费不足，未能推广扩充；一由于无合宜之师，足课

①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